

师,首先必须建造好自己的灵魂,再去建造别人的灵魂,至少也要在提升笔下人物的灵魂的同时,提升自己的境界和灵魂。

在文艺家自身人格的建设上,我主张继承我国古典文论和古代美学中的“养气”理论,给以现代的阐释,倡而导之,践而行之,光而大之。养什么气养?养浩然之气,元气,正气。

养气之论,最早是孟子提出来的。他在《公孙丑》篇说:“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。”他对自己提出的这个“浩然之气”的解释是“其为气也,至大至刚”,如果“直养而无害”就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。孟子的文章,好辩而又气势磅礴,无论论理,还是叙事,都不显局促和小气。这和他的善养其浩然之气绝对不是没有关系的。值得注意的是,孟子善养的气,是以心志为统率(帅)的,它充实于人的生命体之内,并且只有与义和道相匹配、相结合,才会有力量,变得至大至刚,“浩然”起来,而充塞于天地之间。真的把一己人格,修养到这种境界,也就近圣了,邹鲁儒者都是主张积极入世的,包括养气在内的以修身养性为特点的人格建设,都是以用世、以建立事功为指归的。所谓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就是对此的最规范的系统表述。因此,我以为,必须把养气和孟子讲的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劳其筋骨,苦其心志,行拂乱其所为,所以动心忍性,增益其所不能”联系起来看。就是说,孟子的养气,决不是关在屋子里的超然冥想,而是在艰苦的实践中完成的。养成什么样的人格呢?就是要“威武不能屈,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”。孟子

的这段话,刘少奇在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》里曾加以引用,并作了精彩的发挥。

孟子的养气说,对中国传统的美学、伦理学和文论,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东汉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,在其传世名著《论衡》里,专立《气寿》之篇,从生命哲学的角度,讨论了人的禀气渥薄与强寿弱夭的关系,似乎更侧重于生物学的方面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里,承王充的遗轨,步王充的踵武,提出了“率志委和”的写作状态,不主张“钻研过分”,因为那样会“神疲而气丧”。刘勰的养气,讨论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如何保持写作主体最理想精神状态,而较少在这一命题之下讨论前写作时的人格修养。倒是宋代的陆游讲清了养气作为主体人格建设与文章的关系。记得有一次到朱寨先生家,请教一个问题,说起作文和修身,他引用了陆游的一首诗:“文章最忌百衲衣,火龙黼黻世不知。若能养气塞天地,吐出自足成虹霓”。宋末的文天祥,在其《正气歌并序》里,对于养气与人格的强大、正气所钟的种种表现,特别是他本人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、杀身成仁的道德节操,都作了淋漓尽致表达。序文与诗,可视为对陆游养气诗的最完美的注释和举证。

我们正在经历中国作为大国的和平崛起,我们正在展开一次空前的盛世,我们需要黄钟大吕,需要有上国气象的一代文风,让人提气,让人感慨,让人进取,促人图强。

(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)

## 三十年的思与想

孙郁

一个作家的接受史能成为文化变迁史的参照,大概就有了经典的意味。

鲁迅自然是这样一个人。

我在鲁迅研究室前后工作过十几年,对这个领域略有观感。说鲁迅研究史是现当代文化观念演变的一个标本性的存在,也不过分。它本身就是一部大书,虽然每个人的理解并不一样。

鲁迅研究算起来已有八十余年历史,如今已成显学。有时在民间热烈非凡,有时被高高置于象牙塔

里。它也曾被弄到吓人的地步,亲近政治,陷于各类风潮。其实按鲁迅心性的特点及文本的形态,把它神秘化、政治化和学院化都是有问题的。但这门学科有它自己的特征,和时代的关系颇密,也与人生的苦乐大有关联。鲁迅之于现代知识阶级的话题,在今天不是弱化,而是更浓烈了。这门学科的复杂性,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进一步呈现出来。

以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三十年来的情形为例,倒是可以发现这个学科的轨迹。我以为这里折射

的信息,和这个学科的深层话题纠缠着。这里想谈两个问题,一是研究室自身的情况,一是研究室主编的《鲁迅研究月刊》的学术状态。两者给人的印象不同,但内在的隐含实在是丰富的。

鲁迅研究室成立于 1976 年。当时的任务是整理鲁迅的遗稿,对其辑校古籍、遗物进行研究,并编辑出版鲁迅年谱等。由于还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,相关的研究不能不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。比如保卫鲁迅、批驳自由主义文人的言论等在那时颇被重视。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初,情况略有变化,学者的研究视野也出现新的内容。比如随着周扬的出山,关于鲁迅的解释就开始面临新的难点。周扬因历史的原因,靠自己的影响力,覆盖了对鲁迅的某些解释,对胡风等人的看法与鲁迅不同,甚至把一些观点输送到研究界。以李何林为首的研究人员对此进行了长期的争论,研究兴奋点被 30 年代的话题限制了。比如关于“两个口号”之争,关于左联宗派主义问题,对立的地方很多,应当说,在这些是非之论中,还掺杂着意识形态的话语,双方难免不被历史的旧账纠缠。80 年代初是历史的过渡期,这些争论导致了人们对其价值的反观,老一代的学者王元化最早地意识到这一点,提出要从更开阔的视野来研究鲁迅,而不是把他狭隘化。王元化早年是鲁迅研究的新锐,二十几岁所作的鲁迅与尼采的论文光彩照人。后来经由黑格尔、刘勰的研究,而形成大文化的观念,他对鲁迅研究的看法就异于别人,意在把研究从简单的功利层面移到深层的文化静观中。这个看法很快被更年轻的一代人接受,先前的意识形态话语受到质疑,研究室的方向也开始出现变化。李何林先生指导的第一位博士王富仁,就在思想的根基上动摇了旧的思路,将鲁迅从政治话语的体系里解放出来,即淡化实用主义理论,从更深远、更历史的角度打量鲁迅与他的身后的历史。王得后关于“立人”思想的阐释,陈漱渝关于史料的辨析,李允经关于美术史中的鲁迅的把握,都和 1976 年前后的语调有别,思想解放的步履渐渐出现了。

那时候《鲁迅研究资料》和《鲁迅研究动态》的出版,对矫正意识形态化的叙述方式无疑有着不小的意义。80 年代知识界的任务之一是“新启蒙”,鲁迅传统被李泽厚纳入自己的“历史积淀说”的话语结构,解放思想的热潮里,也能感到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疏散出的意念。不过鲁迅研究室似乎还在汉学的传统里打转,人们开始对现代文学的一些基本史实进行考释,把一些不被注意的材料提供给学界。比如鲁迅的同

时代人的关系透视,他的藏品,往来信件的整理,都有亮点。所藏汉画像的勾勒,所藏碑帖的研究,丰富了学科的内涵。接着是周作人资料的整理、开掘,都有新面貌。周作人附逆的讨论打开了思想界的另一扇大门,周氏兄弟的对照研究里深化了诸多难点的思考,这在后来得到了更年轻一代的响应。钱玄同的日记,钱氏收藏的信件也被展示出来。他的文集的注释出版,把“五四”的背景扩大了。初期的研究室有八大顾问,王瑶、唐弢、林辰、孙用、杨霁云、戈宝权等,都为理论建设和资料建设做了不少的工作。王瑶关于鲁迅与古典文学关系的思考,与流行的理论区别开来,显示了学识的深切和境界的阔大。后来钱理群、赵园在他的引导下,进入了更深的研究层次。林辰在文章里考辨了许多史实,他对鲁迅与苏曼殊关系的梳理,对古典小说与鲁迅的关系的探索,对这支队伍的影响是不可小视的。较之于一般的理论研究,鲁迅研究室属于汉学的流脉,注重资料,本于版本,就少了夸夸其谈。王得后的《〈两地书〉研究》就是从校勘出发,探寻鲁迅的思想,至今依然被世人瞩目。陈漱渝在《鲁迅史求真录》里对史学界的错误言论的辩论,还原了一些疑虑重重的事件本质,给人诸多启发。赵瑛的那本《籍海探珍》,对鲁迅辑校古籍的描述,殊多真语,不涉空言,一时被人称颂。她从鲁迅的大量的辑校古籍文献中,发现了鲁迅精神迷人的地方,比那些醉心于玄学的学者显示出扎实的基础。李何林就亲自撰写鲁迅与 30 年代论战的史料文章,在格局和眼光上力摧旧垒,都有不少的深度。他本乎良知,远离玄言,所带的队伍形成了一个流派。在知识界大讲人道主义和异化学说的时候,鲁迅研究室的同人们贡献的是史料扎实的著作,在那时的影响力是毋庸置疑的。

90 年代后,鲁迅研究开始清冷起来,研究室的兴奋点分别转向鲁迅的藏书研究和同时代人的交叉研究。探讨鲁迅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,也多少推动了认知的进化。这里,姚锡佩女士对德文资料和日文图书的研究令人难忘。她从鲁迅外文图书里发现了许多鲜为人注意的话题,廓清了鲁迅思想背景的模糊的地段。后来关于鲁迅译文全集、鲁迅藏品的出版,都是在廓清研究的精神地图。像鲁迅的译文全集出版,是近五十年间的一件大事,它的问世不仅给研究者提供了新的资料,也证明了鲁迅首先是翻译家,同时也是作家的看法。而汉代画像的几次出版,能发现鲁迅对传统的一个基本思路,那就是在主流文化之外的支流话语世界,存在着一个健康、朗然的精神世

界,汉画像的整理其实证明了先生非凡的视野,他意识到,如果说要复兴旧的艺术,那自然是汉代画像这样的艺术。它们没有道学的东西,是无伪的存在。鲁迅需要的正是这个存在。这些资料的研究给学界的启发是巨大的。鲁迅世界的原色的一面,可以让研究者体味到旧的道德话语对他的肢解。恰恰这些颠覆了旧的思路。人们注视他的时候已不再像过去那么简单了。

这三十年间,鲁迅研究室最大的贡献是打造了《鲁迅研究月刊》这个平台。

当《鲁迅研究月刊》行世后,鲁迅研究室实际上成了中国鲁迅研究的中心。这个杂志几十年间展示了这个学科的基本形态,重要的思潮和观点都折射在这个世界里。从80年代起,月刊集结了一批史料专家和思想者。前者以林辰、朱正、陈子善、陈福康、朱金顺等为主,后者是钱理群、王富仁、孙玉石、林非、刘再复、汪晖、王乾坤、郜元宝、高远东、李新宇等为亮点,在整体上显示了知识界的质量。日本的丸山升、伊藤虎丸、木山英雄、丸尾常喜、北冈正子也在此显示了自己的实力。三十年间,中国知识界关心的思想问题和学术问题,在这些人的文字里都有体现。说鲁迅研究是中国知识界思想高度的一个参照,有时也并非夸大之谈。

上述诸人的思想在这一时期展示了精神的多样性。钱理群《心灵的探寻》曾在青年那里有深切的辐射,是思想解放期间重要的收获。他从鲁迅获得的自由无伪的意识,为当下知识界带来鲜活之色。王富仁最初的论文,显然受到别林斯基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影响,在一较大的框架里建立了对鲁迅认知的新视角。他提出的“回到鲁迅那里去”的观点,还原了文化史的一页,撼动了泛意识形态的理论根基。随后汪晖从现代哲学的角度,切近对象世界,发现了历史的中间物的特征,就把鲁迅的精神哲学从古典主义论述话语转入现代主义的视野里。他凭着良好的哲学感觉,梳理了鲁迅世界那个不确切的一面,从整体上改变了旧的书写逻辑,无疑是研究界的一次思想进化。不久王乾坤《鲁迅生命哲学》的连载与出版,在哲学的层面丰富了学科的语境。他不仅受到康德、海德格尔的暗示,也受到庄子、老子的熏陶。把旧哲学和现代哲学打通了,置于一个丰富的世界里。而更年轻的学者高远东,从文化的历史里,发掘鲁迅小说与古典文化的复杂联系。他关于鲁迅与墨子、庄子、老子、孔子的论述,资料的娴熟与理论的力度,都超越了前人的视界,厚重的文化感在论文里呈现了出来。在他们的研究过程里,明显地呈现出这样的痕迹:鲁迅作为思想解放的

参照,他为转型期的人们提供了诸多鲜活的精神元素,现实理性的投射是无疑的。可是后来人们不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打量,当王富仁《中国文化的守夜人》、王乾坤《鲁迅的生命哲学》出版后,“鲁迅学”作为一门学科,显示了它的成熟性。这里不仅涉及到传统国学的问题,也和知识分子的价值态度纠葛在一起。当代知识界最关心的话题在鲁迅研究者那里多少得到了回应。

研究的多维性,证明了鲁迅的百科全书性的价值。这个领域的开阔和深度吸引着无数人文学者参与讨论。钱理群、陈平原、王晓明、陈思和、薛毅、李新宇在近几十年都贡献了他们的思想。钱理群的忧患感和陈平原的自觉的学术理念不同,但在精神深处却纠葛着相似的元素。王晓明的研究是延伸性的,90年代初关于“人文精神”的讨论,内涵着鲁迅式的焦虑,或者不妨说,把鲁迅研究的心得移进当下的思考里了。鲁迅研究的辐射性颇值得关注,这门学科在当代的影响力使它也具有了反象牙塔化的倾向。所以,一方面是日趋的学院化的叙述,一方面是当代性的言说,鲁迅学像孔学一样成为知识阶层绕不过去的话题。说他有元典的意味,不能不说是对的。

近三十年域外的哲学思潮对文学批评界的影响毋庸置疑。西方马克思主义、存在主义、后现代主义等新理念不断渗透在批评家与文学史家的思想里。许多研究者看到了鲁迅文本与这些理论建立关联的可能性,并从鲁迅的世界寻找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对话的途径。汪晖、梁展、刘禾都贡献出重要的文章给世人。在讨论现代性和全球化问题时,鲁迅当年的选择在今天的语境里被一种新的意识所激活。至于日本、韩国、美国、法国学者的论述,同样有新奇的地方。韩国学者在跨文化的研究里,发现了东亚问题的新的语境。鲁迅使他们看到了抵抗西方与汇入普世价值的意义。不过这些韩国学者和日本学者一样,是带着本国人的困惑与问题意识进入鲁迅的。他们希望能像鲁迅一样承受着沉重的东西。人们普遍认为,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的作家,其精神的深层领域与西方重要的思想家、作家都有可以对话的地方。而且其中引发的课题,是极为丰富的。

域外鲁迅研究著作在近三十年的大量翻译,刺激了国内鲁迅研究的深化。普实克、李欧梵、竹内好、丸山升、伊藤虎丸、木山英雄、丸尾常喜等人的著作,使国内学人意识到鲁迅成为话题的深层意义。甚至在对作家伊萨克·巴别尔、博尔赫斯的译介里,人们也联想起鲁迅。30年代鲁迅对巴别尔的赞誉引起了

许多学人的注意。至于比较文学领域里的时空就更为开阔。但丁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、加缪、萨特等与鲁迅的比较，把中国的现代性引向更为广阔的思想领域。在对现代性的陷阱的警惕这一思路中，鲁迅成为东亚思想史的资源而被不断引用。

亲近鲁迅的还有一批民间思想者，这些反象牙塔化的人士在三十年间也留下了自己的痕迹。林贤治、邵燕祥、蓝英年、陈丹青等以另类的声音表达着对鲁迅的理解。林贤治的文字是岩浆般的激流，那是从野草里生出的热浪，毫无伪态，是诗的流淌。也因过于偏执而引发争论。陈丹青的陈述是画家式的敏感，他从一种生命知觉里切近研究对象，就把学院派的老气驱走了。至于邵燕祥的随笔，那多是对 30 年代思想的回应，在忧思里衔接着远去岁月的激流，让人流连忘返。这些人在精神的原色里延续了鲁迅的传统。他们不是从学理上架构鲁迅的世界，而是从生命的原则里继续着鲁迅式的智慧与审美之光。鲁迅研究与鲁迅意象，就这样在学界和知识界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。《鲁迅研究月刊》多少记录了这个过程。

当代作家加入到对鲁迅的思考里，丰富了这个学科的研究。莫言、大江健三郎等对鲁迅的兴趣给世人诸多的兴奋点。莫言是坚持鲁迅的道路的。他的小说《酒国》被翻译到日本时，大江健三郎就嗅到鲁迅的意味，对此有着高度的评价。大江先生对鲁迅的推崇，可能与他的知识分子的立场有关。他从中国作家对“五四”理念的继承中也看到了日本作家的问题，他自己对鲁迅的读解，释放着一种绝望和挣扎的精

神。而这一点与莫言极为相似。在纪念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时候，莫言在鲁迅博物馆有一个发言，被学界的许多人所注意，那就是“自己的写作一直是没有离开鲁迅的”。他的表达也令人想起刘恒、张承志这样的作家。他们的文本一定程度折射着《呐喊》、《野草》的意象。在与鲁迅很远的地方与鲁迅相逢，给批评家带来一种历史感的冲击。研究者们从鲁迅主题的延伸里，发现的题旨是很有挑战性，是无疑的。

从一个小小的研究室看一门学科的走向，自然能嗅出其间的气息。庆幸的是这里没有封闭的病态，它一直和现实发生着多种多样的联系，以致和学院派形成了两股势力。鲁迅研究室还给无数作家留下了自己的空间。莫言、阎连科、李耳都是这里的客人。这里还为王小波、汪曾祺举办过纪念展。鲁迅之外的世界，其实恰恰闪烁着现代知识分子的话题，他们与鲁迅传统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。鲁迅的开放性，已是一个事实，从鲁迅之外的景观里考释现当代文化的流脉，也许对未来的研究者更有引力。

三十年间只是短短的一瞬，但鲁迅的话题的丰富性却让我们不得不对这门学科抱有期待。鲁迅研究是个没有终点的跋涉，未来的可能性给我们的刺激恐怕更多，历史证明了此点，未来也会这样，对此我深信不疑。

（作者单位 鲁迅博物馆）

责任编辑 陈剑澜